

共同富裕背景下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成谢军¹ 成春林² 刘学东³

(1.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商学院,江苏南京 211200;2.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3.南京审计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指导中心,江苏南京 211815)

[摘要] 以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使命为出发点,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利用31个省(区、市)2000-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就教育水平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展开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教育水平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方向为正,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教育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经济开放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惯性,需采取有效举措控制,以防失控。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程度有明显差异,中部最大,西部次之,再次是东部,东北最小;处于不同收入差距分布上的地区对教育水平的依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水平对不同收入差距的地区存在不同的影响作用;不同教育层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明显差异,高中及以下层次的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小也不显著,大学及以上教育层次影响较大且显著。

[关键词] 共同富裕;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倒U型关系

[DOI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24.02.012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24)02-0150-11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邹伟等,2021)^[1]。就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要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等问题”。在区域性差距、行业性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三大问题上,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最大且最引人注意的问题,因此缓解进而切实有效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事关实现共同富裕全局,也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2035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

[基金项目]江苏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江苏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研究”(B/2021/01/67)

[作者简介]成谢军(1978-)男,山东菏泽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城乡经济、教育管理。

从全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看,城乡居民收入比自1978年到现在基本维持在2.5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3。如果考虑非货币化影响,比如城镇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获得的福利以及农村居民收入的一部分实际上转化为农业经营成本投入,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将高于统计数据之比。超出合理范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也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影响收入的因素很多,人力资本往往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因素(Chiswick, 1971)^[2],而形成人力资本的因素普遍视为教育,因此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特别是中国家庭,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都高度重视子女教育,尽一切可能为子女提供教育资源。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那么,教育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了吗?可以促进共同富裕吗?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教育与收入差距的研究颇为丰富,但不同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已有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教育水平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增加了高技能劳动者的供给,使得高技能供给者的报酬下降,同时减少了低技能劳动者的供给,如纯体力劳动者,从而提高低技能供给者的报酬,缩小二者收入差距(Cardak, 1999)^[3]。在政府不断提升教育水平过程中,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低收入者有可能获得免费的教育资源,表现出教育的“公平效应”,缩小收入差距(龙翠红, 2017^[4]; 刘生龙, 胡鞍钢, 2019^[5]; 睢党臣等, 2021^[6])。二是教育水平会扩大收入差距。由于高收入者有能力支付优质教育资源的成本,如私立教育或家庭教师,公立教育又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区域,所以教育水平的提高加大了收入差距(Simhon, 2002^[7]; Glomm 和 Kaganovich, 2010^[8])。在中国,教育成本相对较高,优质教育资源供需十分失衡,高收入群体拥有的教育资源更为丰富,获得的教育机会更多,相比较而言低收入群体教育资源匮乏,教育机会偏少,不对等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王小鲁, 2006)^[9]。教育水平回报的收益率在中国呈现递增趋势,学历越高收益增加越多,同时高学历者往往迁移到更为发达的地区,高低学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也在加大(李实、丁赛, 2003^[10]; 熊广勤、张卫东, 2010^[11]; 郭凤鸣、张世伟, 2020^[12])。政府在加大教育投入过程中,由于城乡教育投入的不均衡,事实上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关会娟, 2018)^[13]。三是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在城乡提供的初始教育水平就具有差异,城镇教育优于农村,教育回报的累积效应使得收入差距加大,但教育带来的高学历工作者的增加会产生工资压缩效应,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因而存在不确定性(Ram, 1989^[14]; 张兴祥, 2012^[15])。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教育的回报率会有明显变化,教育投入一旦超过某一阈值,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将由正转负(李鹏、王明华, 2014^[16]; 詹国辉、张新文, 2017^[17]; 许永洪等, 2019^[18])。

已有文献对厘清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有良好的参考价值 and 借鉴意义,实证研究文献主要采用了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结论的不一致说明了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较为复杂,经仔细梳理发现现有成果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有些研究使用的数据过少、缺少对稳健性问题的讨论导致结论不够严谨等。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试图对上述不足做出一定的弥补,运用2000-2021年全国31个省(区、市)数据,构建合适的理论模型与计量模型,分析了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和自相关问题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计量手段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最后通过异质性分析讨论不同类型的教育以及不同程度的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既充分保障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又讨论了不同情况下的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以及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三、理论模型构建

文章在Diamond两期代际交叠模型基础上,为研究方便和接近现实经济,对理论模型提出以下假设:经济个体生活期为三期;当前生活的经济个体与未出生的经济个体不产生交易;政府借助政策调控不同经济个体的经济状况。

模型中,经济个体经历少年时期、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经济行为人在少年时期接受父母的养育和社会教育,储备自身的教育知识水平。经济行为人在年轻时期付出劳动获得报酬,进行消费决策、储蓄决策及子女投入(这里主要考虑子女教育)决策。经济行为人在老年时期由于失去劳动能力不再获得收入,该时期的消费由储蓄、子女的回报以及社会保障来支撑。

假设 t 时期出生的经济行为人的效用函数满足如下公式:

$$u(c_{1,t}, c_{2,t+1}) = u(c_{1,t}) + \alpha u(c_{2,t+1}) \quad (1)$$

$c_{1,t}$ 与 $c_{2,t+1}$ 分别表示经济行为人在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的消费,为便于分析不考虑经济行为人在少年时期的消费, α 表示经济行为人老年时期消费的贴现率。经济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具有符合可微递增的凹函数的性质,并符合稻田条件,即: $\lim_{c \rightarrow 0} u'(c) = 0, \lim_{c \rightarrow \infty} u'(c) = \infty$ 。

一般而言,经济行为人在年轻时期接受的教育水平不同,用 e_t 表示经济行为人在年轻时期获得的教育储备,将教育储备的差异视为同一代际经济行为人之间的最大差异(即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差异),便于分析可以假设第 t 期经济行为人的教育储备服从正态分布函数 $E_t(e_t)$ 。教育储备决定人力资本水平, \bar{e}_t 表示该期经济行为人年轻时期的社会人均人力资本水平,故有 $\bar{e}_t = \int_0^{\infty} e_t dE_t$ 。经济行为人需要做出的决策包括自身在年轻时期的消费、老年时期的消费、生育子女的数量 n_t 及质量 e_t 。子女的数量 n_t 及质量(e_t)决定了未来对父母的回报能力,记为 m_t ,设 $m_t = n_t^\rho e_t^\eta$, $\rho \geq 0$ 表示子女的数量对于父母回报的贡献度, $\eta \geq 0$ 表示子女的质量对于父母回报的贡献度。考虑中国家庭的实际情况,可以假定 $\rho > 1$,即父母更倾向于生育更多的子女,当然伴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偏好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为简化讨论,进一步假定除去抚育和教育费用之外,家庭养育小孩仅需付出时间成本。

经济行为人在年轻时期的收入由供给的劳动数量与质量决定,劳动数量以劳动时间表示,劳动质量主要由教育水平 e_t 决定,因此其收入可表示为 $w_t = \omega_t e_t$, ω_t 表示教育水平的平均劳动报酬率。经济行为人老年期获得的子女回报 m_t 通常与子女收入成正比,故 m_t 还可以记为 $m_t = \delta w_t$ 。社会保障主要来自政府税收,考虑大多数国家的税收都设置为比例税,所以假设为比例税,税率为 τ 。经济行为人在少年时期接受父母抚育和社会教育,将父母抚育和社会教育总投入记为 h_t ,父母收入决定了 h_t 的大小。

根据以上分析和假定,进一步假设经济行为人的效用函数为 CRRA 函数,具体为:

$$u(c_t) = \frac{c_t^{1-\theta} - 1}{1-\theta}, \theta > 0 \quad (2)$$

则出生在 t 期的经济个体效用最优化可表述为:

$$\max_{c_{1,t}, c_{2,t+1}, s_t} \frac{c_{1,t}^{1-\theta} - 1}{1-\theta} + \beta \frac{c_{2,t+1}^{1-\theta} - 1}{1-\theta} \quad (3)$$

$$\text{s.t. } c_{1,t} + s_t + h_t = w_t(1-\tau-\delta) \quad (4)$$

$$c_{2,t+1} = s_t(1+r) + m_t + g_{t+1} \quad (5)$$

其中, w_t 是年轻时期的收入, s_t 是年轻时期的储蓄, r 为利率, g_{t+1} 为社会保障。 r 由中央银行决定, g_{t+1} 由政府决定, 均为外生变量。

以上分析讨论了不同经济行为人在子女教育投入等方面的决策过程, 重点分析不同家庭投入教育资源的不同所导致的收入差距, 不同的教育投入又导致了下一代的收入水平差异。由于中国的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在教育投入上存在明显差异, 且政府提供的城乡公共教育产品也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教育成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诱因, 不同家庭投入教育资源的不同导致收入差距。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 技术、资本等重要资源不断向城市倾斜, 进而造成巨大的教育资源差异, 使得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 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增大。但是, 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 政府必将采取一系列举措为实现共同富裕保驾护航, 其中均衡教育资源是重要举措。因此, 在实施共同富裕后, 教育资源趋于均衡, 此时, 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具体机制如下。

首先, 为了推动城乡实现共同富裕, 政府会加大财政投入来改善农村的教育、交通等条件, 促进教育普惠化, 提高农村教育水平, 进而缩短城乡收入差距。在教育基础设施方面, 中国实施了“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程等举措, 更新乡村学校校舍、教学设备等基础设施, 完善了办学条件, 提高了教育质量。尤其改善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教育基础设施, 会提高农村教学的完备性、精准性。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 当公路、公共交通等完善后, 农村学生上学的途径增多或者时间减少, 提高了教育效率及其可得性。总之, 基础设施是实施教育的前提条件, 偏向农村的教育普惠化会减小收入差距, 推动共同富裕。

其次, 政府通过加强农村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 会吸引人口、资金等要素, 推动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 强化教育的共同富裕效应。交通、教育等基础建设的增强会吸引学生从城市向农村回流, 拉动教育水平的提高。教学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会吸引教师回乡就业, 强化农村教育的师资力量, 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便利的交通条件缩短城乡通勤时间, 智慧教室等教育基础设施有助于城乡异地教学, 这些增强了城乡教育资源的共享性。

最后, 城乡间的资源调配、要素流动会加强城乡联系, 形成网络化的城乡空间格局、现代化的劳动分工格局, 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化, 切断贫困代际传递, 使城乡共同富裕具有可持续性。通过对农村教育、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扶持, 吸引和加快城市要素向农村流动, 会提高农村受教育机会及教育水平。当农村的人力资本增加后, 会促进城乡分配、分工体系的合理化, 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最终,中国借助教育传导作用来缓解农村落后局面,进而缩小城乡差距,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综合上述分析,政府会考虑教育水平对收入及其城乡差距的影响,通过加强农村教育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人口、资金等资源向农村流动,并且通过形成良好的城乡网络建设、劳动分工格局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化、公平化,促进城乡减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四、模型设计与实证结果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为合理客观地刻画城乡收入差距,规避因不同的测算方法引起的数据不一致,文章利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表示。

2.核心解释变量:教育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相对于其他替代指标,人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更好地反映教育水平的深度。

3.控制变量: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无法全部放入计量模型,参考陆铭等(2005)^[19]、周心怡等(2021)^[20]的做法,将经济发展、城镇化率、经济开放度、政府支出、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引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使用人均GDP来表示,城镇化率使用户籍城镇居民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表示,经济开放度使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政府支出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GDP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值和第三产业值之和占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市场化水平直接使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研究样本为中国31个省(不含港、澳、台地区),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中经网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等,数据跨度为2000-2021年。

(二)模型设计

基于上述分析,考虑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性,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为:

$$\ln IG = \alpha \ln EDU + \beta \ln IG(-1) + \delta_1 \ln PGDP + \delta_2 \ln UR + \delta_3 \ln TRA + \delta_4 \ln GE + \delta_5 \ln IND + \delta_6 \ln MI + \varepsilon \quad (6)$$

其中,IG表示城乡收入差距,EDU表示教育水平,PGDP表示经济发展,UR表示城镇化率,TRA表示经济开放度,GE表示政府支出,IND表示产业结构,MI表示市场化水平。

(三)实证结果

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可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在不存在内生性的情况下,最小二乘法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存在内生性,则可能是有偏的。表1的列(1)给出混合回归的OLS估计结果,列(2)给出作为基准回归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列(3)给出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列(4)替换了被解释变量指标,使用泰尔指数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列(5)替换了核心解释变量,使用财政性人均教育经费投入表示教育水平。

列(1)的OLS混合估计结果的拟合优度和各变量系数检验均显著,但该结果可能忽略了各截面的个体效应可能与解释变量有一定的相关性,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列(2)给出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列(1)相比,核心解释变量教育水平的系数由负转正,由此可以推断OLS混合估计结果是有偏差的,不是一致估计量。

表 1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估计方法	OLS 混合估计	固定效应估计	动态 GMM 估计	动态 GMM 估计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1)	(2)	(3)	(4)	(5)
lnEDU		-0.051 (-1.253)	0.245*** (8.913)	0.263*** (13.894)	0.212*** (3.740)	0.180*** (6.531)
lnIG(-1)		0.663*** (45.275)	0.896*** (87.603)	0.857*** (87.373)	0.682*** (41.935)	0.968*** (75.748)
lnUR		0.039* (1.724)	-0.127*** (-3.758)	-0.218*** (-7.468)	-0.213** (-2.195)	-0.201*** (-3.338)
lnPGDP		-0.022*** (-5.641)	-0.025*** (-7.742)	-0.024*** (-3.791)	-0.014*** (-2.844)	-0.016*** (-4.404)
lnTRA		-0.027*** (-3.840)	0.033*** (2.857)	0.031*** (6.342)	0.042*** (3.606)	0.056*** (3.818)
lnGE		0.148** (2.161)	0.067** (2.562)	0.073*** (5.904)	0.085*** (3.672)	0.048*** (3.163)
lnIND		-0.002 (-1.037)	0.007* (1.832)	0.005** (2.157)	0.010** (2.326)	0.008*** (2.742)
lnMI		-0.029*** (-2.683)	-0.045*** (-4.363)	-0.036*** (-7.526)	-0.029*** (-5.477)	-0.031*** (-6.835)
Adjuster R ²		0.986	0.981	0.977	0.992	0.993

注: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为进一步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检验固定效应模型的可靠性,保守采用各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为工具变量,使用动态 GMM 估计有效克服双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并解决小样本偏误和个体异方差等问题。列(3)-(5)的估计结果显示所有解释变量的方向与固定效应模型是一致的,且各解释变量都是显著的,仅在显著性和影响程度上有一些差异,表明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是可靠的。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和列(3)没有方向上的差异,说明结果是稳健的。

表 1 显示,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初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进一步分析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是线性关系还是非线性关系,在估计方程中加入教育水平的平方项,发现教育水平一次项的系数还是正值,教育水平二次项的系数为负值,两者均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长期中教育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倒 U 型关系。教育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与龙翠红和洪银兴(2011)^[21]的研究结论相同,原因在于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实施共同富裕后,教育资源较为均衡,此时,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二次项系数得到倒 U 型关系的结论不够严谨,采用二次回归的方法检验倒 U 型关系的可靠性。基于二次回归,教育水平的极值点为 9.85,由此创建和教育水平相关的三个新变量 $\ln EDU_{\max}$ 、 $\ln EDU_{\min}$ 和 high, 然后进行断点回归,回归结果显示 $\ln EDU_{\max}$ 的系数为 0.135, 伴随概率为 0.04, 显著为正, $\ln EDU_{\min}$ 的系数为 -0.087, 伴随概率为 0.02, 显著为负, 说明教育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确实是倒 U 型关系。这表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期,教育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达到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后,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味着在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为实现共同富裕蓄力。

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系数较大,说明城乡收入

差距有较大的惯性,政府如不加以政策调控,城乡居民收入失衡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城镇化水平提高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缩小作用,同杨德勇等(2022)^[22]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意味着城镇化水平提高可以有效控制城乡收入差距,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化一方面使得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进入城市,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另一方面改善了农村的基本设施,提高了单位农业投入的产出收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说明目前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为农村居民所享有,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已见成效,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将更有效地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经济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城镇的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更有利于发展对外经济,使得城镇居民对外经济往来中获得的收益更高,同时要注意的是,经济开放度的系数在所有解释变量中是最小的,即影响程度最小。

五、异质性分析

(一) 区域异质性

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间差异可能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将全国31个省(区、市)按照通用的划分标准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对式(1)进行回归分析,考察教育水平对不同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见表2。

表2 分地区的异质性检验

地区 \ 变量	lnEDU	lnIG(-1)	lnUR	lnPGDP	lnTRA	Adjusted R ²
东部	0.125*** (9.07)	0.647*** (73.26)	-0.115*** (-6.89)	-0.054*** (-7.39)	0.036* (1.97)	0.997
中部	0.173*** (11.53)	0.745*** (41.32)	-0.527*** (-8.29)	-0.021*** (-9.67)	0.047** (2.14)	0.993
西部	0.146*** (6.35)	0.813*** (25.76)	-0.256*** (-4.76)	-0.011*** (-6.67)	0.063** (2.23)	0.996
东北	0.096*** (4.85)	0.682*** (33.54)	-0.095*** (-6.89)	-0.031*** (-9.86)	0.029** (2.35)	0.985

表2显示分地区的估计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无方向上的变化,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与表1是相同的,分区域检验说明无论是东部、中部、西部还是东北,表1的估计结果都是稳健的,充分说明了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区域异质性视角下具有广泛性。具体看,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部最大,西部次之,东部再次,东北最小。从目前中国不同区域的教育资源看,东部区域的教育资源已达到全国最高水平,继续提高教育资源的空间有限,因此人均受教育水平已进入到平稳期,导致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对较小。西部教育资源虽然较为匮乏,同时吸引优质教育资源流入的能力有限,但人口稀少,加上国家对西部区域实施政策倾斜,人均受教育水平尽管提高较为缓慢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使得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高于东部区域。中部区域的教育资源相对高密度的人口比较紧张,同时在地理位置上与东部区域临近,有比较迫切的增加教育资源的需求,同时也有相对西部更好的条件增加教育资源供给,因此中部区域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速度更快,也使得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对最为明显。东北地区近十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处于全国中下水平,在人口呈现净流出特点的同时,高素质人才流失也相对比较明显,特别是高学历人才普遍向东

部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均受教育水平,使得东北地区的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对其他区域较小。

(二) 分布异质性

在当前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较为突出的时期,探究教育水平对不同收入差距分布的地区的影响程度,可以更为全面地考察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为此,使用分位数模型考察教育水平的分布异质性,分别在 10%、30%、50%、70%和 90%的水平上进行估计。

表 3 分位数估计结果

变量	$\tau=0.1$	$\tau=0.3$	$\tau=0.5$	$\tau=0.7$	$\tau=0.9$
lnEDU	0.088 * (1.659)	0.087 *** (4.862)	0.114 *** (8.956)	0.130 *** (9.448)	0.195 *** (16.501)
lnIG(-1)	0.921 *** (51.591)	0.963 *** (94.360)	0.974 *** (132.621)	0.981 *** (103.851)	0.990 *** (80.540)
lnUR	-0.140 * (-1.658)	-0.059 (-1.266)	-0.122 *** (-3.188)	-0.194 *** (-5.106)	-0.307 *** (-7.388)
lnPGDP	-0.009 (-0.695)	-0.014 *** (-3.879)	-0.017 *** (-5.606)	-0.018 *** (-8.097)	-0.026 *** (-11.839)
lnTRA	0.006 (0.220)	0.008 (0.647)	0.027 *** (2.937)	0.046 *** (5.673)	0.083 *** (6.151)
Adjuster R ²	0.741	0.808	0.834	0.841	0.825

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检验显示(略去检验结果),除 lnUR 在 τ 为 0.3, lnPGDP 在 τ 为 0.1, lnTRA 在 τ 为 0.1、0.3 时不显著,其余所有系数均通过检验,另外斜率相等检验 Wald 值为 29.641,伴随概率为 0.013,说明分位数回归与均值回归的结果有显著差异,即分位数回归方法是合适的,回归结果是可以接受的。无论是低分位回归还是高分位回归,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变化关系与表 1 是一致的,再次说明表 1 的动态 GMM 估计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低到高逐步变化的过程中,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始终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不断上升,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各分位点的城乡收入差距将上升 8.8%、8.7%、11.4%、13%和 19.5%,说明中国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呈递增趋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随着教育水平提升,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由于城镇居民获得的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同时伴随着教育收益率递增,造成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三) 不同教育层次的异质性

为检验不同教育层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选取每十万人小学生人数、初中生人数、高中生人数和每十万人大学生及以上人数四个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4,结果显示长期中每十万人小学生人数、初中生人数、高中生人数和每十万人大学生及以上人数都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每十万人小学生人数、初中生人数、高中生人数系数都很小,分别只有 0.005、0.008 和 0.015 且不显著,而每十万人大学生及以上人数系数为 0.214 且显著。说明教育层次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扩张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缩小作用。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高等教育扩张导致高学历群体的稀缺性下降,进而拉低了高学历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而高学历群体普遍聚集于城市,最终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原因之二可能是高等教育扩张可以增加社会人才储备,促进人才的城乡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的挤压效应,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收敛(Ding 等,2021)^[23]。以上分析讨论了不同教育层

次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发展不同层次的教育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影响程度有明显不同。上述讨论为未来中国发展教育可以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表4 不同教育层次估计结果

变量 方法	小学	小学×小学	初中	初中×初中	高中	高中×高中	大学	大学×大学
GMM 估计	0.009 (0.78)	-0.005 (-0.69)	0.013 (0.86)	-0.008 (-1.27)	0.027 (0.94)	-0.015 (-1.07)	0.162*** (3.76)	-0.214** (-2.24)

注:为直观表示高中与大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直接列出二者估计结果,其他控制变量未显示。

六、结论与对策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核心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行为人的收入水平,因此是制约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基于此,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保证结论稳健性的情况下,充分讨论了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发现如下结论: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扩大作用,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影响越发明显,同时经济越开放,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惯性,需采取有效举措控制,以防失控。

随着中国进入“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为此必须控制好城乡收入差距,增强全体人民幸福感。基于上述实证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在大力发展教育的同时,努力实现城乡教育质量均等化。“十四五”时期应在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基础上,狠抓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着力提升农村地区办学水平,提高农村家庭子女的高中录取率。通过缩小城乡中小学教育质量差距,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创造有利条件,为助力共同富裕奠定基础教育基石。

二是加大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制定向农村倾斜的教育政策。大力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学校的硬件水平,在职称评定等方面优先考虑长期扎根农村的教师,培养稳定的农村教师队伍,逐步实现乡村人才振兴,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教育硬软件基础。

三是继续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注重发展面向农村和农业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当前由于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异,城市家庭子女录取率明显高于农村家庭子女录取率,现有高等教育规模很难满足农村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限制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为此需要进一步实施高等教育扩张,特别是发展农村与农业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更好地满足农村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需求。通过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及增加农村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助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前提。

四是缩小城乡教育投入差异,阻断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教育主管部门应千方百计保障农村教育硬件设施建设,向低收入家庭发放教育补贴,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家庭实施教育帮扶,要求和引导教育补贴用于子女教育用途,防止农村适龄儿童由于上学难和上学远等问题产生辍学现象,降低受教育水平。尝试建立城乡师资联动机制,鼓励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发放支教津贴,评优评先进和职称晋升优先,变形式支教为有效支教,真正实现城乡师资一体化和均等化。

参考文献:

- [1] 邹伟,于佳欣,樊曦,等.从“共”字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N].人民日报,2021-12-09.
- [2] Chiswick B R. Earnings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1, 85(1): 21-39.
- [3] Cardak B A. Heterogeneous preferences, education expenditure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J]. Economic Record, 1999, 75(1): 63-76.
- [4] 龙翠红.中国的教育回报率是如何分布的?——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7, (04): 135-140.
- [5] 刘生龙,胡鞍钢.效率与公平:高校扩招与高等教育回报的分位数处理效应[J].学术研究,2019, (04): 72-84+177.
- [6] 睢党臣,李清明,陈旭东.教育差距对城乡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 (01): 17-23.
- [7] Simhon F A.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equality and growth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2, 7(2): 117-136.
- [8] Glomm G, Kaganovich M. Distributional effec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an economy with public pension[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10, 44(3): 917-937.
- [9] 王小鲁.中国收入分配向何处去?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6, (01): 20-23.
- [10] 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06): 58-72+206.
- [11] 熊广勤,张卫东.教育与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农村的经验研究[J]. 统计研究, 2010, (11): 40-46.
- [12] 郭凤鸣,张世伟.农民工过度劳动是“自愿选择”还是“无奈之举”?——基于过度劳动收入补偿的分析[J]. 劳动经济研究, 2020, (04): 75-94.
- [13] 关会娟.教育投入与受教育程度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J]. 经济统计学(季刊), 2018, (02): 194-212.
- [14] Ram R. Can educational expansion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1989, 8(2): 185-195.
- [15] 张兴祥.我国城乡教育回报率差异研究——基于CHIP2002数据的实证分析[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06): 118-125.
- [16] 李鹏,王明华.城乡教育差距与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12): 24-32.
- [17] 詹国辉,张新文.教育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外部效应[J]. 财贸研究, 2017, (06): 37-46.
- [18] 许永洪,萧珍丽,朱建平.教育缓解了收入分配不平衡吗? [J].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19, (04): 704-718.
- [19] 陆铭,陈钊,万广华.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J]. 经济研究, 2005, (12): 4-14+101.
- [20] 周心怡,李南,龚锋.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受益均等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评论, 2021, (02): 61-82.
- [21] 龙翠红,洪银兴.收入不均、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J]. 江苏社会科学, 2011, (06): 13-18.
- [22] 杨德勇,代海川,黄帆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门限效应研究[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3]Ding X, Huang Y,Gao W.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human capital and physical capital on building sustainable economi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Energies,2021,14(19):1-14.

(责任编辑:王 瑞)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Level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mon Prosperity

CHENG Xiejun¹, CHENG Chunlin², LIU Xuedong³

(1.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200,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3.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Guidance Center,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oretical review, this paper raises questions and uses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00 to 2021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 on how education level affects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with a positive direction. As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creases,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level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economic openness, the greater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contribute to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a strong inertia, and effective control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to prevent it from getting out of contro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levels on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the eastern,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The central region has the largest impact, followed by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n by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has the smallest impac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education level among regions with different income disparities, and education level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income dispariti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Education at high school and below has a very small and in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while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and above has a larg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education level;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